

公共艺术（音乐）学科教育改革探微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Public Art (Music) Discipline

周洁媛

Jieyuan Zhou

四川省贸易学校 中国·四川 雅安 618000

Sichuan Trade School, Ya'an, Sichuan, 618000, China

摘要：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大量引进西方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交错结合，对国家形象进行了热情的想象建构。论文以王光祈在“少年中国”理想中关于音乐学科领域的美育理论为例，从王光祈“少年中国”理想中的思想基础溯源，对其倡导建立的民族性国乐教育中所赓续的传统儒家礼乐思想进行考略，进而对王光祈在“少年中国”的理想中对传统礼乐观的创造性延展进行探析，展现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错的话语特点下，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基因在音乐教育改革中的活化。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intellectuals have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combined the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image with enthusiasm. Taking Wang Guangqi praying in the ideal of “Young China” on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y, for example, from Wang Guangqi “Young China” ideal of ideological basis, to advocate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ity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persist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s on music examination, and then to Wang Guangqi in the ideal of “Young China” the creative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ritual optimistic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It shows the acti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gene in the music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West culture interlaced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关键词：音乐教育；美育；改革；民族性国乐

Keywords: music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reform; national Chinese music

DOI:

1 基因探源——“少年中国”中王光祈美育思想溯源

“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理想化建构，而这种热情的想象，主要是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为指导的。此外，王光启在音乐领域的“少年中国”理想是建立民族音乐，因此他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借鉴也成为其美育思想的组成部分。

1.1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导向

“少年中国社”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1919年7月1日成立。它将“以这种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1919年7月15日。”作为其学会的宗旨，并创

立《少年中国》为其学会会刊。《少年中国》月刊中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对国家形象进行了热情的建构。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形象，展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早期创始人的王光祈在一生致力实现的“少年中国”的理想构建与实践活动中，从对民族性国家蓝图的勾勒再到企图通过“工学互助团”的建立来进行实践，亦是民族性国乐的提倡，都表现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征。例如，他提出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运动，便可以叫作和平的经济革命。这里体现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

【作者简介】周洁媛（1997-），女，中国四川汉源人，硕士，从事艺术史研究。

1.2 传统“礼乐”的文化借鉴

“工学互助”实践以失败告终。作为社会政治家，王光祈在德国生活，转而从音乐研究。在音乐领域探索实现“少年理想”的道路。他认为像孔子那样对礼乐进行提倡，可以实现以礼乐兴国，最终能实现复兴华夏的最终理想。1923年，王光祈在柏林撰写的《德国音乐与中国》一文中写道：“中国的孔子学说完全建立在礼乐之上。”又如他在《音乐与生活》一文中提到的礼乐的重要性。“自孔子立教以来，中国提倡用‘礼’来控制我们在外面的行动，用‘乐’来培养我们内在的灵魂……因此，音乐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与一切生活息息相关。”也体现了他对孔子儒家礼乐教化作用的肯定，并将这些观点付诸其所倡导的国民性音乐实践。

2 血脉赓续——礼乐文化下王光祈“少年中国”理想的建构

王光祈后来转型音乐学研究，即使在德国，他也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汲取养分和灵感。提出传统孔子儒家礼乐文化的对于兴国振邦的重要作用。由此在美育思想上以“礼乐复兴”的方式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思想，在音乐领域将对民族性国乐的建立作为“少年中国”理想实现的奋斗目标 and 实践活动，勾勒出其内心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理想社会的蓝图勾勒。

2.1 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

五四运动时期，在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热潮下，少年中国作为具有五四时期话语特点的代表性新文化团体，提出各种“少年中国”的理想，各流派充满了对国家形象的热情想象。“少年中国”成了一个充满空想社会主义特征的乌托邦。后期转向音乐研究的王光祈在《欧洲音乐的演变》中提出，“近年来，在中国普遍有学问的人逐渐知道，从政治方面寻求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无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转身专注于社会方面；因为社会是一切政治的源泉，所以没有不好的社会，只有好的政治。”并认为，人是拥有感情和意志，但当时的国人处于一种“颓唐堕落”的状态，并提出要想‘唤起中华民族再兴’只有‘恢复民族特性’。“礼乐复兴”的理念由此而生，这与其“少年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通过影响改造社会的思想是一致的。

2.2 少年中国理想的提出

受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当时社会广大青年振国兴邦与改造社会寄予的殷切希望，因而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象征。这种对当时社会广大青年的寄托，使“青年”成为理想国家形象的重要内涵。想象中国少年的形象成了五四运动中的话语特征。因此，《少年中国》的理想和《少年中国》月刊的命名，都是基于国家少年形象特点的典型代表。在“少年中国”的理想中，国家形象有着各种理想化的建构。在音乐领域，王光祈“少年中国”理

想的建构，则是从儒家孔子礼乐思想的承接中，企图以建立民族性国乐的方式，以“礼乐复兴”来达到复兴中华的最终目的。王光祈曾认为：“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以礼乐为基础。并将‘爱和平，善礼让，重情谊，轻名利，是也’。作为对礼乐的定义。因此，他在音乐领域的“少年中国”的理想实践——民族性音乐，更强调的是蕴含着民族情感和美德的“礼乐”思想。

2.3 民族性国乐的提倡

在音乐学研究上，王光启“少年中国”的理想目标是建立民族音乐。《欧洲音乐的演变》也对国家民族音乐的建立提出了他的巨大期望：“作家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中国将来能够产生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音乐。虽然弘扬民族音乐是“少年中国”在音乐领域的理想实践，但王光祈认为，这种弘扬民族音乐强调音乐对社会的影响，即通过民族音乐的展示，弘扬民族精神去影响人心，才能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种美育思想显然有孔子儒家礼乐教育人心的明显观念色彩。

3 旧瓶中的新酒——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基因的激活

王光祈所提出的“礼乐复兴”虽从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中进行了承接，肯定了孔子“礼乐”观念的意义与作用。但在五四时期大量西方理论引进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时代热潮下，王光祈并未全盘接受儒家“礼乐”思想。而是将“礼乐”进行了创造性的延展，将儒家礼乐文化中的“和谐”内涵以音乐和精神的“谐和”统一所替代，将传统“礼乐”文化与西洋音乐文化融会贯通，以建立民族性国乐的方式作为“少年中国”理想目标的奋斗实践。

3.1 “和谐”与“谐和”之替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中，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仁”，即“爱人”。具体而言，可以用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表述。而“仁”是以“礼乐”为中心的思想内涵。在儒家的仪式乐观主义中，“礼”是外在的等级规范，“乐”是内在的精神要求。即用“礼”来限制“乐”的范畴，合理化“礼”的等级顺序。至于王光启“复兴礼乐”的核心与传统儒家的“礼乐”思想，显然是有区别的。王光启提出的“礼乐”思想的核心，主要来源于其音乐美育理念的“音乐演变命题”，其核心意义在于“和”。至于儒家的《礼乐》，其核心是“仁”。这是一个封建社会。背景下，等级秩序的“和谐”是父子、君臣之间的等级观。它是整个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儒家“礼乐”文化中的“礼”与“乐”的关系，是以“礼”来规范“乐”，更强调“礼”。在王光启“礼乐复兴”的主张中，“礼”只是被视为一种“官员对国家，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准则。而从“礼与乐”的关系来看，王光启更侧重于“乐”，而“礼”只是“乐”的一种形式和“附带”。因此，从王光启在音乐学上的观点可

以看出,他的“礼乐”思想是要取代儒家“礼乐文化”核心中的音乐“和”与态度“和”的统一。“和”是“仁”的意思。从这点上看,王光祈的音乐美育的观念中,其实并无封建社会的色彩。

3.2 音乐“谐和”与精神“谐和”的合一

在王光祈的音乐美育思想中,他主张用西洋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创造新的民族音乐以适应时代潮流,有着“参加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成一个对立形势”的远大抱负。王光祈“礼乐”思想观念的核心是“谐和”。他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特性其实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谐和态度”,并且他认为这种“谐和态度”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特性”,同时接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的他还同时强调音乐自身的‘谐和’。作为音乐的元素,王光祈认为“音乐本身就包含着和谐,所以听音乐的人就会受到它的影响,与它产生和谐。”因此王光祈认为“礼也者,所以指导吾人外面之行动者也。”而“乐也者,所以调谐吾人内心之生活者也。”所以王光祈提出的“礼乐复兴”思想的核心与儒家传统“礼乐”思想将“礼”作为“乐”的规范,“乐”必须从属于“礼”不同,反而“礼”不过是外在的形式表现,是精神“谐和”的一种外化,只是“乐”的一种附属。因此,王光启认为,精神的“和谐”,就是自身、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可以消除各种“人类自私自利的习惯”。于是在王光祈的音乐美育观念中,音乐的“谐和”作用和中华民族的“谐和”精神态度的统一成了其“礼乐复兴”主张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涵。

3.3 “少年中国”理想的实现——建立民族音乐

在王光祈后来的音乐研究中,“少年中国”理想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乐。在他的音乐进化论中,他认为“旧”的形式是可以丢弃的,即“古礼古乐之不适于今者,自当淘汰,然礼乐本意则千古不磨。”所以《礼乐》真正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而建立民族性国乐最主要的思想基础,就是“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最早、最明确的理论阐释。即是指采用西方音乐的调式谱式和乐器等音乐形式对国人的思想情感表达。王光启借鉴西方音乐形式的研究和创作,建构和整理

“民族音乐”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他“少年中国”理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他曾经有这样一句慷慨激昂的话:“吾将登皇崑之巔,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可见王光祈对民族性国乐发扬光大的理想信念,并将之作为其音乐研究中“少年中国”理想实现的奋斗目标。在这种信念中,王光祈把音乐的“和”作为培养人的气质的方法,把“和”的精神态度作为民族音乐的灵魂。这两者构成了他在音乐领域中对审美教育的主要理解。

4 结语

改良活动失败后的王光祈后留学德国转向了对音乐学研究,他从儒家礼乐观中汲取灵感,并终身对“少年中国”的理想进行实践——提出“礼乐复兴”。以从音乐领域对社会进行改革,力图以乐感人唤起民族独立精神实现社会改革,复兴中华。虽然后半生旅居德国,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但王光祈不忘祖国之根,倡导建立民族性的国乐,显示出他浓烈的爱国精神。而王光祈在音乐研究方面的美育思想对于社会的影响及所作出贡献,都毋庸置疑使他跻身于五四时期先进优秀分子中的一员。

参考文献

- [1] 沈有鼎,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1):261-271.
- [2] 张允侯,殷叙彝.五四时期的社团[M].上海:三联出版社,1979.
- [3] 少年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 俞玉滋,修海林.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J].音乐研究,1984(3):13-23.
- [5] 永春.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 [6] 梁维东.《少年中国》与中国形象的建构[D].郑州:河南大学,2007.
- [7] 王光祈.王光祈文集[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 [8]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9] 王光祈.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 [10] 夏莹.五四时代的“少年中国”梦想[D].成都:西南大学,2009.